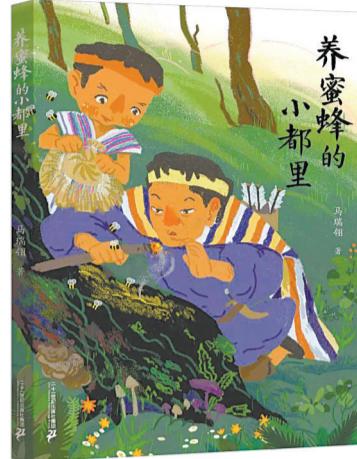


云岭阅读

用力书写独龙秘境 甜蜜事业和美好生活

——读马瑞翎《养蜜蜂的小都里》

凌之鹤



马瑞翎新著《养蜜蜂的小都里》(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22年6月版)是一部清新欢快如山泉奔流,流动着民间气韵的儿童小说。该书通过对独龙族少年小都里暑假生活经历的生动讲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多个角度巧妙地反映了独龙族在新时代的生活变迁和思想观念逐渐嬗变的历史进程,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喜人成就。

独龙族是云南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族这一响亮而豪气的族名,是周恩来总理根据该族聚居生活的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民意愿取的。独龙族有语言无文字,历史上依靠刻木结绳记事、传递信息,日常生活(农耕时代)主要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主;当地民居多为木房或竹房,长期保持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美德;妇女曾以黥面为美,从前有文面之俗。

作为一个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长年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独龙族人民,因为交通闭塞,像“一条扎紧了的口袋”,文化滞后,受自然生存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滞后,总体生活长期处于深度贫困之中。据相关新闻报道,2010年以来,云南省开始对独龙江乡独龙族启动“整乡推进、整族帮扶”项目和相关扶贫工作。2018年底,独龙江乡率先实现整族脱贫,独龙族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巨变。独龙江乡数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独龙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气象,是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宏的壮丽画卷,深刻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独龙人民深切关怀。

怎样讲述独龙人生活千年大跨越这样一个近乎神话传说的伟大历史进程?一些作家以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本拿出了优秀作品。曾长期从事小说创作且取得非凡成绩的马瑞翎,却以大幅“跨界”之势华丽转向儿童文学探索,近两年相继创作了广受好评的《独龙江上的小学》《木鼓敲响的日子》两部儿童文学力作,今年又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养蜜蜂的小都里》。这部儿童小说关注的是独龙族人民稳健走向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景象,与讲述独龙族在实现整体脱贫之前“一师一校”即

鱼水情深 可歌可泣

——少数民族电影《红麦》观后

和松阳

近日,红色文化主题电影《红麦》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深受观众好评。作为红军长征过丽江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和长期关注红军长征影片多年的读者,我深受电影《红麦》的触动。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18000多名将士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等率领下进入丽江,在玉龙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帮助下,用4天3夜成功抢渡金沙江天险,甩开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北上四川甘孜境内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实现了长征史上主力红军部队三军大会师的伟大胜利。红军经过丽江时留下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也留下了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尤其是玉龙太安乡红瓦村人民群众抢救红军伤员、掩埋经过螳螂坝时牺牲的红军战士,世代守护红军墓的感人故事可歌可泣,至今广为传颂。《红麦》以此为背景,以女红军伤员田双妹被纳西族小伙子木老三一家多次机智相救的感人故事,表现了丽江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善良淳朴为民族为人类解放事业奉献自己大仁大义的民族气节。

《红麦》的拍摄主场景取景于云南省丽江市境内的白沙镇、太安乡、九河乡、大具乡、石鼓镇等地,影片中呈现的美丽自然景观与云南少数民族群众朴实善良又深明大义的朴素情感相得益彰。影片《红麦》以小见大,通过人物的故事展现了红军长征过丽江这段历史。影片里的一些经典台词也深深打动了观众朋友的心。

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我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只要在外当兵的后生牺牲了,就是村里的英雄,这幡子要飘6天6夜,还要请东巴做招魂仪式,这是村里祖辈传下来的老规矩,这规矩不能破”。朴素的语言道出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众的道义坚守,边陲之地的纳西族人口不多,但历朝历代都保持着这样忠于国家大义的优良传统和民族气节。

《红麦》以艺术的视角全面展示了丽江世居兄弟民族团结、和睦、友善、纯朴的形象;真实还原了丽江民众迎接、认识、接受、拥护红军的过程;深刻阐述了重温、学习、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大意义。《红麦》一改战争影片依托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表现主题的模式,以平凡人物、平凡场景、平凡故事来

反映颇具重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之壮举,加之影片的服装、形象、语言与现实生活和民族习俗紧密联系、无缝衔接,更加增添了影片的生活性、大众性、现实性。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创作领域一朵独具魅力的艺术之花,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一直以多样的艺术风格、多彩的民族特色、丰满的人物形象、优美的音乐舞曲、英雄主义、团结友爱、家国情怀、崇高理想和时代正能量而广受观众的喜爱。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从民族电影主体逐渐趋于寻求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文化意向回归传统,思考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形态的冲突等,它从过去政治加风景的叙事方式,逐步过渡到了民族风情与原生态的展示及对民族精神的深度诠释,对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虔诚思考,以及对人类共同理想、诗意与尊严的执着追求。同时,也因为有不拘一格的叙事方式,出现了一大批丰富多彩并具有文化价值的本土少数民族各类型电影。每部优秀的电影背后必然需要“一剧之本”的电影文学剧本来作为支撑它的基础,这点笔者在2015年创作剧本《遗忘的时光》中深有感触。

《红麦》的编剧、导演张春和是多年深深扎根于少数民族电影艺术土壤的纳西族导演。他1958年生于丽江石鼓,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系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他将当代东巴绘画融入电影,刚进军营,这个热情英俊的纳西族小伙子就当上了电影放映员,1987年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美术师,一干就是30年,临近退休时又做起了编剧和导演。不移其志地想为本民族拍摄几部电影的梦想从离开家乡从事电影事业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扎根在心中。也正因为怀有这长久的情怀,他后来的所有精力和感情都已投入到本民族的影视创作的艰辛的苦差事上。目前已完成了《云上石头城》(纳西鹰猎人)、《云从雪山飘来》(兴盛番族)、《云天外》(森林格格母)、《忠义坊》、《红麦》、《白沙丽人》、《愿》、《革囊渡》、《东巴、东巴》、《承诺》十几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其中《云上石头城》《愿》《红麦》已

经拍摄成片。

在张春和看来,一个成功的剧本,它的故事内核尤为重要的。影片应有颇具特色的开始、高潮、结尾、巧合、冲突才能使它构成妙不可言的戏剧性。特别是重要因素的强弱,对影片外在类型的成败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命运的诸多可能性之中,创作者用自己的灵感和悟性虚构故事,从而完成对于现实情景升华性的审视。关注人物命运,探索人物的生命体验,发现每一个人物的相同与独特性,进一步发现生活的隐秘性和不同人物身上的隐秘性,正是影视剧作的永久魅力。

电影《红麦》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又超越了故事本身,通过少数民族群众在面对红军战士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种种情感和正义之举,体现了作品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精神境界,也体现出在困难面前深明大义,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和对逝者生命的尊重与关爱,通过影片表现的故事,可见作者建立在丰富生活底蕴基础之上的想象力、创造力,也体现了作者深深扎根少数民族群众当中的文化体验和情感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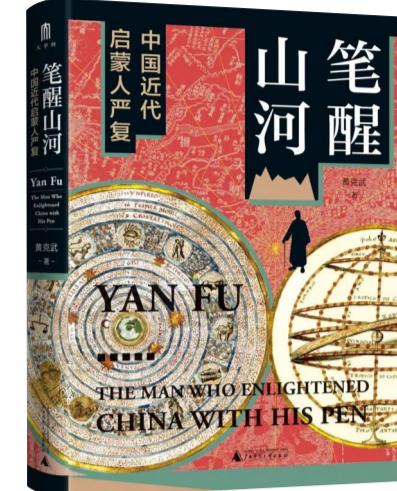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新书快递

真实再现觉醒年代启蒙家形象

——读《笔醒山河》

邓勤



多位启蒙先驱的际遇,从而还原了一幅觉醒年代的真实图景。在作者笔下,严复并非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一个时常踽踽独行的身影。作者试图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作者认为,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幼年时代研读中国典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与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学。同时,却未抛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的信念。返国后,严复师事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定中西学问的基础。他不但用这种态度培养他的子女,后来在主持几个教育机构时,更将中西合璧的构想付诸实际,来教育学生。他一生秉持的理念是“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也让严复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作者认为,严复长期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扯。他深深感受到悲伤与苦痛是人生所难以避免的经历,在遗嘱之中他说:“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人生的智慧不在于达到完美的境地,而是在于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中,超越现实的痛苦。

在清末民初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严复是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变革者。本书不仅是一把认识严复的钥匙,更是一个理解百年革命狂潮的切口,它以生动、精准的语言,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这位近代启蒙家诸多不为人知的内容,为读者还原了一个丰满的严复形象。

娜嬢撷珍

一个人的阅读史

张旗

为什么喜欢读书?我说不清楚。大概是发现书里有我不知道的世界,有我不了解的人生,生活里没有的人和事物,我可以在书里找到,包括那些难以言表的情感。

1953年,古镇州城南街出售新书报刊的代销处,迁至州城西街南侧,改为“新华书店宾川支店”。铺面临街,在一坊瓦屋面楼房的底层。白底红字的木牌上,繁体行书“新华书店”四个大字,神采飞扬。那时我刚上学,还记得父亲在那里给我买过一本《人民画报》,封面上端画的是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白鸽下,是天安门广场上庆祝国庆浩荡游行的群众队伍。我在那儿买过《南征北战》《吕梁英雄传》几本连环画。无一例外,我的读书始自于读图。

1954年,我从乡下老家到古镇州城上学,新华书店就成了我时常光顾的“阅览室”。我究竟在那儿买过多少书,大体上还是记得的,毕竟都是我心爱之物。让我感慨的是,在我的数千册藏书中,现在还能找到在那儿买的一本《谁是最可爱的人》,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那种繁体字竖排右侧装订的老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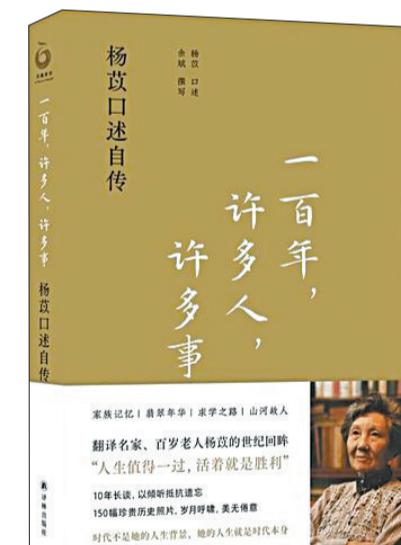
1956年,新华书店随县具、县政府迁往牛井镇,三间铺面,仍然是土木结构瓦屋面的老宅,就在下窝铺南面,牛井镇老中心街的下段。1958年的一天,我们在新村坡原宾川一中分校建校劳动。那天,在那儿买到刚出版的《烈火金刚》的那个同学,得意洋洋的神气,让穷学生的我,羡慕得要死。我拿不出那1.20元书钱,当时那是我们6天的伙食费。还记得那个读了《苦菜花》的同学,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给我们讲述土匪头子柳八爷和路八军于得海团长比试枪法那一章,听得大家如醉如痴,让他大出了风头。

后来,我也在那儿买过一些书,那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从教以后,读书成了功课,进城办事或购物,总要光顾一下新华书店。那时,新华书店给我像我这样手头并不宽裕,而又特别喜欢读书的读者不少优惠和方便。过一段时间,书店就把一部分存书打折出售,特别是有的读者因调动搬迁,或清理旧物清理出来的旧书,还可以在那儿寄售,价格便宜。我买的大多就是这两类书。现在还有一部分收藏在我的书橱中,上面还有原主人的签名。

1972年,新华书店告别栖身10余年的民房老宅,迁往新村坡,建盖了自己崭新的楼房铺面。我至今仍珍藏着的,1977年《世界文学》复刊

新书架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出版



由杨苡口述、余斌撰写而成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日前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2023年1月第1版)。这是一部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先生唯一口述自传,记录了一位百龄女性的成长史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也是一个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

出生于1919年的杨苡(今年1月27日去世),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能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等,还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通信集《雪泥集》(与巴金合著)等。由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杨苡的人生经历了几个时代,也碰到了很多人,而其中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段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吴宓、巴金……这些在书中记载的人物,其实都是她记忆里鲜活的存在和同路人。书内还收录了自20世纪初以来150张珍贵历史照片,辅以翔实注文作为口述的延伸和补充,十分难得。

郑千山

内部发行的一、二期,就是朋友私下领我到书库里买到的。上面连载了前苏联作家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巴金选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至今没忘,在“家庭生活细节”一节里,赫尔岑写到父亲对他的教诲:“生活中最重要的是礼貌,它比最高的智慧,比一切学识都重要。”

1980年代,我力所能及地购买了一部分经典名著。同一外国经典名著,还喜欢购置不同的译本比较阅读。一个个大师站在了我的书架上,缕缕书香,似阵阵清风,轻轻拂面,缓缓抚平我因生活奔波而浮躁起皱的心弦。那是我读书受益最多的一段人生。

托尔斯泰说,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人的成长和完善,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是离不开文化经典的哺育与滋养的。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鉴赏力的提高,我发觉有些书你读了好多本,其实就等于读了一本。比如我曾经读了很多本战争小说,但直到读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才算是读到了第二本,直到读了巴尔的《骑兵军》才算是读到了第三本。博尔赫斯说:“《骑兵军》无与伦比。”它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忍的场面的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86年,《欧洲人》杂志评选出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受时代思潮和文学风尚的影响,青年时代,为探求人生的意义,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直到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读了毛姆的《人生的枷锁》,知道人生还有爱,还有丰富的人性,让我明白,应该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不记得这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它包含了被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珍惜的人性里面的勇气、怜悯、忍耐和崇高的品质。我喜欢的经典名著,同一外国作品,则喜欢购置不同的译本比较阅读。无论何时何地,与它们邂逅,总会有一种潜在的与之凝视与对话的感觉,给我以信心、定力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心里头就会泛起生活的激情。

人性无法改变,读书却能扩大认知,纠正偏见。当一个人无知的时候,可能会做出没有人性的事情,这才是最可怕的。在一个喧闹的世界里,多读书,多思考,不随波逐流,就是活在了人生的高地。